

数字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创新

贺立龙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对经济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厘清数字经济学内容及框架的基础上,阐述数字经济学理论范式构建的主要维度和基本内涵,分析数字经济学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内在关系,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理论体系的重点任务。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学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改变经济活动的一门新兴经济学科,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数字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领数字经济学发展,才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创新中,必须把数字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统一起来,并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推进数字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完善数字经济学发展创新的支撑体系,需要弘扬开放包容理念构建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将数字经济学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基础性工程,重点探索构建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数字经济学科发展范式。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数字经济学;数据要素;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3.9;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4-0046-12

收稿日期:2023-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29)

作者简介:贺立龙(1981-),男,山东泰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f digital economics

HE Lil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operation mode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tent and framework of digital economic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dimensions and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nomics,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ics and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puts forward the key tasks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ics is an emerging economic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how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has a profound internal connection with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Digital econom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ly by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ics with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an we better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style economy and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digit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unify digital economics with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economic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o improve th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forward the concept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ic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nomics talent team as the basic projec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nomic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Key words: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digital economics; data ele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征程上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亟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伟大实践,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课题进行系统阐释,并围绕经济形势、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经济工作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展开理论阐述^[1]。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形成历史交汇,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数字经济重塑了新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微观层面的调控理论、中观层面的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宏观层面的经济调控理论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影响^[2]。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一系列新实践、新问题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研究和学术阐释。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革命深刻改变人类经济社会活动,驱动以复杂经济学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学范式的崛起^[3]。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亟须构建中国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基于对数字经济本质特征的认识,阐述数字经济学理论范式构建的主要维度和基本内涵,分析数字经济学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内在关系,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理论体系的重点任务。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学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紧密相连,

数字经济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议题,数字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拓展。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理论体系,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主体支撑,科学阐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满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理论需要。

一、数字经济的特征与数字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与产业革命会产生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学理论创新来回答。传统的经济学是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新一轮技术变革下生产要素、生产方式以及商业运行都与传统经济有很大不同,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亟需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以与之相匹配,由此推动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一)数字经济的新特征

“数字经济”概念最早由 TAPSCOTT 提出^[4],是指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对整个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与日益跃迁的信息技术紧密相连,在早期的数字经济定义中特别强调互联网的概念^[5],之后的定义又增加了新技术,如移动和传感器网络^[6]、云计算和大数据^[7]。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将数字经济界定为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数字媒体所形成的3类数字经济商品与服务。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呈现出以下新特征。

一是数据要素逐渐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关键生产要素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原生变量^[8]。云计算、物联网、社交网络等新兴服务促使人类社会的数据种类和规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数据从简单的处理对象开始转变为一种基础性资源。数据资本取代实体资本成为支撑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成为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征^[2]。数据资本是指包含海量信息的流通数据经由分析处理技术衍生出的集成信息资产(如大数据)。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利用数据资本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成为开拓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驱动产业变革的关键。

二是生产方式呈现柔性化和模块化特征。数字技术通过提供广泛、即时、可交互的数据信息收集与处理,促使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融为一体,改变了组织内外的生产组织方式,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虚拟产品边际成本接近于0。生产组织变得平台化、网络化,数字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降低了各类生产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使多元化生产主体可以借助网

络空间协同生产。生产过程更加个性化、模块化,数字连接为有效协调任务分工和合作提供了可能,生产过程由集中化、规模化向分散化和模块化转变^[9]。

三是产权呈现弱化与共享特征。一方面,数字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可以零成本或极低成本复制,具有无限供给的特性;并且一个消费者在使用其产品或服务并不排斥其他消费者使用,数据资源的私有产权属性被逐渐淡化,数据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成为数字经济运行的核心特征^[10]。另一方面,平台商与用户之间基于数据共享的正反馈效应随着共享程度的加深而持续提升,由此产生的价值增量将在平台商与用户之间实现再次分配。对生产者来说,深层信息与流量配额可以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提高生产效率;对消费者来说,大数据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用水平;对平台商来说,个体数据集聚规模的扩张将进一步增强平台商的资源配置能力并带来收入扩张^[11]。

(二) 数字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构建

数字经济学是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数西方经济学理论仍然适用于这一学科范式和理论体系。但是,数字经济发展也给传统经济学带来新的冲击与改变。GOLDFARB et al. 认为,数字经济学是研究考察数字技术是否以及如何改变经济活动的一门学科^[12]。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学及其理论范式具有以下新特征。

在宏观层面,数据这一全新关键要素的融入,重构了生产要素体系进而拓宽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边界。农业经济时代的关键

生产要素是劳动,工业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是资本,但这些传统生产要素都遵循生产要素稀缺和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搜索成本低、复制成本为零、传输成本极低、共享性强等特征^[12],这使得数据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排他性限制,具有很强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此外,数据对资本和劳动具有很强的赋能作用,能够提高其边际产出,进而帮助资本和劳动突破传统生产要素的增长约束,对经济增长产生倍增效应^[13]。例如,企业通过分析用户数据刻画出更复杂、更完整的用户画像,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准确的定制产品和服务;基于数据分析结果选用最优的生产技术,改善产品质量,并获得更多、信息量更丰富的数据,形成“数据反馈循环”^[14]。同时,数据也有助于改善劳动、知识、管理、资本和技术要素的质量和效率^[15]。

在中观层面,数字化的变革带来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拓展。首先,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边界和内涵,数据在不同行业的流动能够提升传统企业的跨界经营能力,使企业有能力实现跨行业与跨领域的发展,实现全新的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16]。其次,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削弱了企业之间以空间关系为联系纽带的作用。以物联网为载体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了产业协同效应,催生产业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形成行业性、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生产互动网络——虚拟集聚^[9]。最后,在数字经济时代,契约日益成为产业组织内部链接的制度运行基础,但执行契约需要一定的信息成

本与监督成本;数字技术能够降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在信息网络中,契约执行的信息能够被全网获知,建立的市场化声誉机制有助于增强产业网络中企业的责任意识^[17]。

在微观层面,数字技术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从消费者行为理论看,数字经济发展使得社会网络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外部性,消费者购买行为不仅取决于自身偏好,还受其他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当用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会形成网络的正反馈效应,形成需求的“集聚效应”^[18]。在数字经济时代,更丰富的产品品种、更低的搜索成本逐渐能够满足小众化、个性化的需求,激发更强的“长尾效应”。从生产者理论看,用户的需求越来越得到重视,个性化生产成为重要特征,从“需求侧”倒逼“供给侧”,导致企业战略目标改变,从而推动了企业组织结构由垂直的科层式转变为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下,供给侧分工得到深化,企业核心能力更加侧重于价值整合、用户体验改善等,消除了冗余的层级,提高了信息及数据传递的效率,有利于更快速地对市场做出反应,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数字交易使得实体交易转移到电子商务平台等虚拟空间中,使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与消费者连接,规模效应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制度层面,随着区块链等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弱化了“信息不对称”假设,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重构,使消除交易成本成为可

能。区块链技术能够将信息作多点记录和共享(分布式记账),从而确保数据存储和交易过程公开透明、不被篡改^[19]。网络平台是交易个体资源分配的虚拟信息集散中心,能够以最低成本提供所需信息,节省了寻找客户或搜索供应商的信息搜寻和处理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冲击了产权理论的前提基础,所有权不再是收益分配的唯一依据,资源使用权成为关键^[10]。尽管数据所有者是单一个体或特定集体,但是数据使用者并不限于所有者^[20]。根据传统理论,私有产权能创造更多效益,但在数字经济形态下,大数据集成后采用公有产权可能有助于实现更大价值^[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与创新激励。

二、数字经济学发展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创新的内在联系

(一)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中国数字产业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2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国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实践过程中各种问题与挑战的理性思

考与积极应对,具有坚实的实践逻辑。早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2000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数字福建”被写入福建“十五”规划纲要建议,科学绘就了福建信息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探索发展数字经济,提出了建设“数字浙江”决策部署,将信息化建设升级为省级重大工程,并将“数字浙江”建设定位为长期战略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同年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上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的倡议,之后又指导出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全面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对数字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深刻阐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三个有利于”: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22]。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论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回顾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的七项重要任务^[2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怎样发展数字

经济”“发展什么样的数字经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是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立足时代背景、基于发展全局、源于伟大实践的经验凝练和理论创新,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随着数字经济实践探索而不断发展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新时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其来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也必然会伴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24]。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拓展经济增长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引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已接近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①。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测算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

案》;在数字经济制度方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指导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就应当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中发展汲取科学的理论认知:“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5],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6]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经济席卷全球,数字经济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与新挑战,例如数字垄断界定与监管^[27]、数据要素交易和配置^[28-29],如何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结构适应性变革,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30]等。同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中国数字经济还面临着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这一系列由数字经济引发的重大实践问题呼唤着经济学理论创新^[31]。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我们要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网,2023-05-06, https://dsj.hainan.gov.cn/zcfg/zybs/202305/t20230510_3413998.html。

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回应并解决新时代数字经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过程中,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三、以数字经济学推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新竞争优势的依托和来源。数字经济学建构与完善,应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创新。数字经济学者担负着为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人才、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

数字经济学是彰显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学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发展阶段转换意味着发展理念更新。中国面临传统发展动力衰减、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以及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一系列新问题、新任务,发展数字经济,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应贯穿于数字经济发展全过程,融入数字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从创新来看,数字经济是创新要素集聚的经济形态;从协调来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是促进行业、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动能;从绿色来看,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赋能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从开放来看,全球价值链贸易正向数

字贸易转变,数字贸易正成为全球开放贸易的主力军;从共享来看,利用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数字经济学要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命题。中国供给体系产能庞大,但大多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根源是结构性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减少无效、低端供给,扩大有效、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质量。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水平提升,以及运用云计算和运用机器学习等手段匹配大数据能力的提高,这些厂商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数字经济运行对供给侧结构重塑产生重要影响。从供给方式来看,从数据收集与分析到数字应用延伸,数字产业链形成与运行能够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专业化分工,提升资源配置和生产交换的效率;从供给质量来看,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使得大范围、多样化、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从供给效率来看,在线协同不受物理空间限制,节省了资金成本,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双线协同使得交易成本大大下降。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数字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

数字经济学要研究如何通过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并做好相应监管,推动高水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一方面,数字资本及平台企业的无序扩张行为给市场及消费者带来负面冲击或权益侵害,亟需推进平台监管研究。掌握海量数据要素的数字平台无序扩张并利用算法构筑市场壁垒,形成各种隐蔽垄断行为。与传统垄断相比,数字平台的双边市场特性和边际成本递减特征,导致平台因汇聚海量数量用户而引发的流量垄断问题,平台垄断流量入口之后进行横向和纵向扩张,将市场垄断力量从一个垂直市场传导至多个垂直市场,从而形成双轮垄断,破坏了创新创业环境,引致数据集中、产业集中、内容集中等风险,亟需多管齐下,从竞争政策、数据安全、基础服务能力和特别监管机制等方面有效治理^[32]。因而,规范与引导平台资本健康发展,做好平台反垄断构成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的重要主题。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带来边际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市场份额的扩大,成为企业发展创新、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互联网资本和平台企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型基建支撑以及数据要素和科技服务,并通过数据要素化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一方面要规范和引导平台资本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支持其做强做优。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成为数字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平台经济具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属性,其既在市场上参与竞争,也通过“市场组织者”身份管理平台上的商家,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平台、商家和监管者的关系,规范市场中的“市

场”,需要数字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四、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理论体系

数字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蕴含着包容、共享、和谐的发展思维,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但是,受资本无序扩张倾向影响,数字经济也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损害,甚至背离社会主义发展理念^[33]。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领数字经济学发展,才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理论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和融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有益知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创新中,必须把数字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统一起来。例如,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在对数字经济的思想认知和发展实践中,亟需进一步探索数据产权的界定与归属,维护大数据的共享性和公用性,防止大数据演变为资本绑架的对象^[11]。再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收入分配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索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的分配理论创新,完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体系,推动中

国数字经济时代分配方式的变革^[3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念为统领,对国内外数字经济研究有益成果进行兼收并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数字经济体系理论。

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推进数字经济学的发展创新。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3]因此,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全面振兴、统一大市场建设、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等标志性概念和关键议题,从数字经济学角度进行学理阐释与观点阐发,从理论指导和政策创新上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提炼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世界数字经济实践和理论创新贡献中国智慧,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完善数字经济学发展创新的支撑体系。第一,弘扬开放包容理念构建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数字经济学具有多学科融合交叉的特征,因此要鼓励以开放包容理念和协同创新思维,推进高校、科研院所与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开展研究合作,包含建立数字经济实习基地,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第二,要重点探索构建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数字经济学学科发展范式。数字经济学发展要破除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方法。特别是,发挥理论自主创新对

数字经济学的推动作用,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观点,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发展范式。第三,要将数字经济学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基础性工程,从人才招引与培养、人才激励与约束等方面入手,加大数字经济学人才队伍建设力度,补齐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人才短板,提升数字经济学人才培养质量。

五、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建设领域的理论指南。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如何推动两者融合发展,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学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改变经济活动的一门学科,一方面,数字经济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数字经济实践与问题探索中不断获得创新发展。

当前数字经济学正逐步融入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国数字经济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探索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是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35]。从历史纵向维度看,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从横向比较维度看,发展数字经济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突

破口之一^[36]。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乃至自主知识体系,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马建堂. 伟大的实践深邃的理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J]. 管理世界, 2019(1): 1-12.
- [2] 陈晓红, 李杨扬, 宋丽洁, 等. 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2): 208-224.
- [3] 安同良, 魏婕. 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 复杂经济学视域下新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学的重构[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12): 5-23.
- [4] TAPSCOTT D.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 [5] MESENBURG T L.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M]. Washington D. C. : U. S. Census Bureau, 2001.
- [6] CONROY S. Australia's digital economy: future directions [R]. Canberra: DBCDE, 2009.
- [7] G20 RESEARCH GROUP. G20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 [EB/OL]. (2016-09-05) [2024-01-02]. <http://www.g20.utoronto.ca/2016/160905-digital.html>.
- [8] 魏江, 刘嘉玲, 刘洋. 数字经济学: 内涵、理论基础与重要研究议题[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21): 1-7.
- [9] 王如玉, 梁琦, 李广乾. 虚拟集聚: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新形态[J]. 管理世界, 2018(2): 13-21.
- [10] 易宪容, 陈颖颖, 位玉双. 数字经济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J]. 经济学家, 2019(7): 23-31.
- [11] 胡晓鹏, 刘子源. 数字经济的理论特征、实践困境与发展思路——以社会主义理念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9): 66-77.
- [12]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1): 3-43.
- [13] 陈雨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J]. 经济研究, 2023(9): 22-30.
- [14] FARBOODI M, MIHET R, PHILIPPON T, et al. Big data and firm dynamics [R]. Massachusetts: NBER, 2019.
- [15] 谢康, 夏正豪, 肖静华. 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 产品创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42-60.
- [16] 陈冬梅, 王俐珍, 陈安霓. 数字化与战略管理理论——回顾、挑战与展望[J]. 管理世界, 2020(5): 220-236.
- [17] 戚聿东, 肖旭, 蔡呈伟. 产业组织的数字化重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130-147.
- [18] 荆文君, 孙宝文.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经济学家, 2019(2): 66-73.
- [19] SCHMIDT C G, WAGNER S M. Blockchain and supply chain relations: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2019(4): 100552.
- [20] PUSCHMANN T, ALT R. Sharing economy [J].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2016, 58: 93-99.
- [21] 徐宏潇. 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生成脉络、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J]. 经济

学家,2022(10):5-13.

[22]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EB/OL]. (2021-10-19) [2024-01-02].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19/content_5643653.htm.

[23]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求是,2022(2):4-8.

[24] 韩保江.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J]. 管理世界,2018(1):25-38.

[25] 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 求是,2020(16):4-9.

[2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5-17) [2024-01-0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27] 周文,韩文龙. 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21(3):103-118.

[28] 谢丹夏,魏文石,李尧,等. 数据要素配置、信贷市场竞争与福利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22(8):25-43.

[29] 熊巧琴,汤珂. 数据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21(2):143-158.

[30] 谢康,肖静华. 面向国家需求的数字经济新问题、新特征与新规律[J]. 改革,2022(1):85-100.

[31] 黄少安. 现实需要如何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J]. 经济学动态,2021(5):41-47.

[32] 李勇坚,夏杰长. 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J]. 改革,2020(8):58-67.

[33] 贺立龙,刘雪晴,汤博. 平台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数字资本的视角[J]. 管理学刊,2022(2):14-27.

[34] 师博. 数字经济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2):182-197.

[35] 刘守英,熊雪锋. 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2022(10):99-118.

[36] 周文,施炫伶. 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发展[J]. 财经问题研究,2023(6):3-15.

(责任编辑:杨海挺)